

“热风”学术

丛书主编：王晓明

**What CAPITALISM
is
Not**

资本主义 不是什么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许宝强 著

“热风”学术
丛书主编：王晓明

F03
23

2007

What CAPITALISM
is
Not

资本主义 不是什 么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许宝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不是什么/许宝强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热风”学术/王晓明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06775 - 2

I. 资... II. 许... III. 资本主义—研究 IV. 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5452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傅惟本

· “热风”学术 ·

王晓明 主编

资本主义不是什么

许宝强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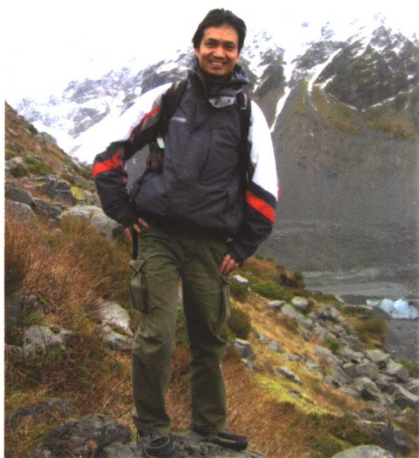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3.25 插页 4 字数 302,000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100

ISBN 978 - 7 - 208 - 06775 - 2/G · 1115

定价 36.00 元



许宝强，现居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通识教育学士后文凭课程主任。著有《资本主义不是什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富裕中的贫乏——香港文化经济评论》（香港：进一步出版社，2003年）；合编“社会/文化译丛”共六本（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学术论文散见《台湾社会研究》、Cultural Studies Review、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等学报。研究兴趣包括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y)、教育与文化研究、社区经济、发展研究、资本主义和市场历史。

封面图片根据画家颜婷的油画作品变形。

扉页、辑封图片均为著名诗人、摄影家王寅的摄影作品。

编者的话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上海已经被看作是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重镇了,但是,上海却至今没有一套文化研究的著作丛书,从这个角度看,“‘热风’学术”丛书第一辑的出版,意义可想而知。

但我这里想说的,却是这丛书的另一个可能的意义,说得更准确些,是它的编者的除了填补某种“出版空白”之外的另一个迫切的意愿。

中国这个庞大的社会,如急转弯的巨轮一般置身于忽而风平云止、忽而涛惊浪骇的大海之中,已经差不多 30 年了。当人们终于发现,这是一种至少 20 世纪范围里人类从未见过的艰难曲折的社会变迁,它不但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已经——还将更为明显地——影响整个世界,1980 年代那种以为援用西方理论便可以清楚地把握这个变迁的普遍的信心,也随之消散。那些理论当然很不错,对我们有启发,但它们对于这个面目全非的新的全球世界——不仅仅是新的中国——的解释力,却也越来越显得有限。更重要的是,这广阔土地上的新的现实,以其变化的迅猛和前景的叵测,日益迫切地要求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对它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甚至——说得严峻一点,作出清晰的描述。身为中国人,每时每刻感受到生活的变迁和压力,如果不能对这生活作出首先是自己觉得可信的解释,岂不是活得太冤?目睹中国的巨变日甚一日地影响整个世界,改变全球未来,却不能以从自己角度展开的中国和世界研究,支援面对全球现实、同样深感困难的其他

地方的同道，那也太令人羞愧了。

可是，无论人对己，要想尽到身为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思想和学术责任，绝非易事。种种外部条件的限制，自不必说，因了各种内外作用而形成的知识界、学术界的自身的孱弱，也早已称得上触目惊心。即以我较为熟悉的大学文科的情形来说，学科体系的老旧、心志的普遍的萎靡、从老师到学生的思想和学术兴趣的淡漠、能力的薄弱……都是人所共见，甚至已经开始令人熟视无睹，不觉得惊诧了。说实话，和这些比较起来，对于中国和全球之新状况的隔膜，对于西方理论之局限的迟钝，都要算是小事情了。而如果上述这样的情形不能较快地得到扭转，所谓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对国人和人类尽责，就只是一句空话。

在我看来，199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逐渐形成的“文化研究”的热潮，根本的意义正在于，它从一个新的方面，表现了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回应新的社会现实的巨大要求的热忱。当然，要做的事情如此艰难，光有热忱是决然不够的。和“文化研究”在北京、上海等地年轻学人中的“热”的程度相比，这方面的研究的实绩是太少了。但也惟其如此，为这样的新的研究的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就显得特别重要。我想，这一套“‘热风’学术”丛书的问世和生长，是不是就能在这“各种条件”的新地基上，砌进自己的一块砖？

最后还要说一句也许多余的话：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活跃的思想和学术活动，它一定没有未来，因此，如何激励创造性的思维和学术活动，为这种活动的成果提供充分表达和交流的环境，已经成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在当今世界长久立足的关键之一。这套丛书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出第一辑，就是因为它的编者相信，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应该——而且也有可能——成为今天整个社会的共识。

王晓明

2007年3月于上海

鸣 谢

本书大部分章节曾于 1996 年至 2006 年间以不同形式发表,但也有部分章节是为了本书的完整性而重新写就的。然而,不论是新写的还是已发表的,都作出了修改和重新编排,祈将一个较为整合的图像和观点表达出来。自然,书写这样一个题目,是永远没法“完成”的,这本小书因此只是一个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逗号。

本书的写作过程和出版过程当中,得到下列朋友的批评、建议和鼓励:丘延亮、汪晖、冼白堇、孙歌、袁伟、许兆麟、陈顺馨、渠敬东、黄平、雷启立、刘健芝、潘永忠、戴锦华、罗永生、罗金义和苏耀昌等。尽管以中文书写,但本书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的老师 Giovanni Arrighi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启发。没有陈翠芳、黄德兴、杨爱媚、刘长青、刘传伟、萧佩斐、薛翠、萧永焯、何咏华和曾仲坚等朋友在数据搜集、翻译和其他技术上的帮助,本书实难以顺利完成。特别要感谢雷启立和赵荔红,没有他们的再三敦促和协助处理繁琐的出版编辑工作,本书也无法与大陆读者见面。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的书写得到岭南大学研究基金的资助。而繁体字版的修改和整理主要于 2000 年 8 月至 12 月间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时完成,在此谨向岭南大学,特别是在笔者休假期间分担了我的教务和行政工作的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同事致谢。

本书繁体字版于 2002 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除了修订繁体字版的一些表述以外,还加长了前言,以回应繁体字版出版后的部分评论;另扩充了部分章节(第八章和第十章),增加了二章(第五章和第七章)。

我的家人:婷、阅、母亲、兄弟给予我的支持是没法在这短短鸣谢中反映出来的,愿你们健康、快乐。

书中部分章节曾以不同形式出版：本版前言部分曾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2004年9月,第275—287页)；第一章曾刊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3期(1998年冬,第177—198页)和《反市场的资本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二章曾刊于《基进论坛——香港文化社会评论季刊》创刊号(1998年1月,第58—67页)；第三章和第十章第五节曾刊于《视界》第二辑(2001年1月,第46—81页)；第四章曾刊于《发展的迷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vii—xxxiii页)；第六章刊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3期(1998年冬,第69—90页)；第八章部分曾刊于《台湾社会研究》(2005年12月,第283—306页)和《香港社会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147—180页)。其他部分章节则以短文形式分别刊于《正义和平》(2001年10月,第12—14页)；《读书》1999年第7期(第18—24页)、1998年第11期(第39—43页,与罗永生合著,笔名林楠)、1998年第8期(第15—22页)、1998年第4期(第3—9页)；《基进论坛》1999年第3期(第100—103页,笔名范棟)、1999年第4期(第90—97页,笔名范棟)；E+E第3期(2002年春/夏,第53—58页)；《草原上》创刊号(1996年5月,第11—12页)。

前言

晚近关于语言的历史和政治性质的讨论,揭示了将语言概念作为“现实”的准确反映的局限(Niranjana 1992; Volosinov 1973)。然而,由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强大影响,与源于零碎的学科分隔的规训性践行(disciplinary practices),这种对语言(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反思,或对“语言”和“现实”自身的反思,似乎没有受到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重视。因此,一些本是人工构造的概念,例如备受广泛使用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和“工业化”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现实西方(包括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准确反映。不论是鼓吹者或是反对者,“资本主义”仿佛已经成为一个不证自明、自有永有的实体,有固定的意思并反映固定的“现实”。

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界定,包括将它看作为一个“私有产权”的体系(张五常 1985),或等同于“自由市场”(Friedman 1982);“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被认为与私产和市场有关以外,更是一种经济理性或“资本主义精神”的结果(桑巴特 1991; Redding 1990)。此外,“资本主义”往往被理解为经济增长/发展的最有效的制度,甚至被想象为“富裕”或“美好”生活的保证。所谓“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经济理性”和“工业化”等概念,不仅被等同于现实的制度和行为,更被理解为是属于“纯粹的”经济领域,与文化、政治或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等无关。

将资本主义等同于“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工业化”和“全球化”,并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甚少质疑这种界定。问题只是,马克思主义拒绝接受由“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所界定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剥削、异

化等等；而“自由主义”则由肯定“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经济理性”，进而肯定“资本主义”。必须指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都值得肯定，而“资本主义”以外的制度，往往只剩下其对立面对立面——“公有（或集体）产权”、“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换句话说，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并不存在“集体中的私有”、“自由的计划”、“反自由的市场”、“自私的平均主义”和“非极大化的理性”等等可能性。

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理解，自然不完全是凭空的虚构，但却肯定是一种单一/同质的想象。庞然的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说明了“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并不那么自由；上市集资企业的规模和机构投资者的剧增，也彰显了“私有产权”的限度；资本家之间的交易行为，除了“理性”的“经济计算”以外，恐怕还包含了各类人情关系的考量；发达国家的“非工业化”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不仅没有减少两者的贫富差距，相反更进一步加剧世界财富两极分化的状况，这正好说明“富裕”与“经济增长”不一定和“工业化”有关。

然而，将资本主义完全等同于“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和“工业化”等纯经济因素，无可否认取得了霸权/统识(hegemonic)的地位，被普遍地接受，甚至以这些建构出来的迷思(myth)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准，据此来改造世界。罗兰·巴特(Barthes 1973)指出，迷思企图成为社会的共识，使原本是历史和人工生成的文化观念，化身成为自有永有的自然法则，将主导群体的利益自然化和普同化，变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迷思的力量建基于将语言等同现实，使人以一特定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同时也将这种理解强加于人。这种现象反映了“资本主义”其实同时是一个文化工程(cultural project)，一个企图使现实世界符合“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等抽象模型的文化计划。

愈趋精细的学科分工是这一文化计划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学院的规训方式进一步框限了这些成为了常识的迷思的批判。学科分工使经济学得以长时期垄断对“经济问题”的发言权，而所谓“经济问题”则

只包括一组狭义的与创造、流通和消费金钱相关的议题,例如财政贸易、金融工业等,将其他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范畴,例如家务劳动、义务工作、礼物赠送等排除在外,而政治、社会甚至与各种广义或狭义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文化领域——经济论述、意义的生产、道德伦理观念、表述/呈现和身份建构等,更不会受到经济学重视,至多只被它约化为可为金钱衡量的对应物。

经济学不仅将自身与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分割开来,经济学内部也不断分割为更“专业”的子学科,于是我们有计量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犯罪经济学,诸如此类,而经济活动的流程则被分割成相对独立的生产(由企业理论和劳动经济学处理)、消费(由需求理论处理)、流通(由贸易理论处理)等范畴。这些细微的分割,使得本是整全的国民生计活动,变得支离破碎,使我们再难以理解丰富多样的经济(生计)践行。与此同时,经济学却为我们提供一幅极为简单的社会图像,把纷杂多样的生计活动约化为单一的金钱积累过程,将“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等简单概念,化作为支离破碎的认知框架底下的统一地基,支撑着整个由经济学建构的资本主义迷思。

因此,要破除这种种迷思,首先得重建一种能够让我们理解经济(生计)活动的丰富多样面貌的视野,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实质经济人类学(substantive economic anthropology)、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资本主义史学和晚近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都是循这进路的有用参照。波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分析方法除了于本书第一章有详细讨论外,也明显地见于本书的各个章节,因此这里只集中介绍同样地指导着本书的写作(但不像波兰尼和布罗代尔般明显)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希望能让读者能够更了解本书所借用的思想资源。

本书所建基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所勾画的一种历史性(historical)和整体性(holistic)分析

架构。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过程本身是一个丰富多面但也是相互扣连的过程,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等各个环节互为前提,并不分割,但同时也不完全等同对方,而正是这些差异的环节之间的丰富而且是历史的关系界定了整个(政治)经济的运作。这过程是“历史的”,因为这些环节与其之间的关系,并不先验地存在,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被扣连出来,因此不存在机械的决定/因果关系,而是蕴含着丰富和复杂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要了解(政治)经济过程,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概括,就必须要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而理论的概念,也只有在结合具体脉络时,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论。

文化研究的方法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研究的其中一个奠基人霍尔(Stuart Hall)及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霍尔的著名编码/译码(encoding/decoding)模型,以及后来英国公开大学(Open University)出版的“文化、媒体和身份”系列中基本的分析架构——“文化的循环”(circuit of culture),就有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的影子。事实上,霍尔在1973年便曾仔细分析了马克思1857—1858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并循此发展出扣连(articulation)这个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据将霍尔这篇写于1973年的文章重新发表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2003年第2期)的J. Macgregor Wise(2003)指出,霍尔的这篇文章对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70年代的理论工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霍尔与伯明翰学派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视野,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历史和整体视野一样,并不排拒整体中的差异,相反,更是从差异中理解整体,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将历史整体分割,制造出简化、“严谨”但往往脱离具体历史的理论模型,是截然不同的。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强调研究历史具体脉络和差异中的整体这两个重要面向,前者也就是我们现在十分熟悉的对在地性脉络(local context)的强调,后者则发展出

扣连(articulation)这个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而脉络(context)与扣连(articulation)可以说是了解文化研究视野的两把重要钥匙。“脉络”并非是指一先验存在的实证整体,而是由一具体的计划(project)定义的、与特定的政治问题扣连的具体生活条件和践行,它可以是细小的社区,亦可以是特定的都市,也可以是全球的经济体系,更可以是同时包含这些不同层次的整体。“脉络”是动态的,经常在变动,而文化研究正是要理解各种“脉络”是如何被制造和再制造,并尝试让人们能够更有效地改变他们身处的“脉络”以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改造的方法,还是通过扣连不同的社会力量,包括文化——意义的生产和流通——所产生的力量(Grossberg 1997; Morris 1997)。

不幸的是,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在地、具体、历史、整体、差异和扣连,在学科分割的现代知识生产制度下只能艰难地生长。相反,在学科体制和传媒强有力的支撑下,知识受到进一步的分割,为资本主义的各种迷思提供良好的生长土壤。与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进路相反,资本主义的迷思建基的,正是一种把道德/文化(语言、概念、意义)与经济(物质、实利、科学方法)分割开来的认知架构¹。在 19 世纪的学科制度的支持下,经济和文化基本上被看成了各自独立的实体,除了有不同的运作逻辑和历史外,各自还可以成为影响对方的“因素”,并以此新的方式再次“汇流”。不过,这种在承认了经济和文化是各自独立的实体后的“汇流”,并没有打破学科分隔的藩篱,相反,更强化了学科分割的趋势。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关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发展的讨论。这个讨论的一个流行版本,是争论“文化因素”(或资本主义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而韦伯(Max Weber 1992)的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中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则被引用作为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经典文献。稍后的争论则集中于东亚的“儒家文化”体系是否也有像新教一样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元

素。(余英时 1987)这种对经济发展所作的“文化解释”,正是在承认了文化与经济是各自独立的体系以后,再尝试将两者拉放在一起的典型案例。

然而,这种“文化解释”不仅无法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参阅本书第三章的分析),更不幸地强化了将文化和经济分割的观点。“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因素”,正是由于它被当成为一独立的变项;反过来说,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被“文化”解释,也说明了它本身并不包含“文化”。

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也同时循另一方式走向“文化”,尝试解释“文化现象”。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芝加哥学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Becker)的“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尝试引用经济学来分析其他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例如以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习惯”、“传统”、“宗教”。(Becker 1976)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也没有真正地打破“文化”与“经济”的人为疆界,而是用经济学的视点取消了“文化”,独留下“经济”的逻辑(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三章的分析)。但遗憾的是,被留下的“经济”,并不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践行(或计划)的结果,也容不下“经济本是嵌入其置身的文化社会脉络之中”这样的视角。

除了主流的经济和文化学科的尝试以外,西方左派学术圈也曾努力修补文化与经济的鸿沟。也许最集中体现这种努力的是于 1995 年由格吾咸(Nicholas Garnham)在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CSMC) 学刊挑起的一次有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论争。

任教于英国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的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的格吾咸认为,文化研究之所以针对经济决定论,主要源自对政治经济学的误解。格吾咸指出,当代的文化践行主要是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之上,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会决定或需求一种唯一的上层建筑(政治形式),它可以与不同的上层建筑形式结合,包括不同的血缘系统、宗教信仰和践行,以至美学传统。因此,政治经济学并非一种带决定论的功能主义。

格吾咸进一步批判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化消费而非文化生产,又

太集中于研究消闲行为而非分析工作践行,并有认可所有流行文化践行都是抗争策略的倾向,因而极易为右翼势力招安,成为消费主义的共谋。为此,格吾咸指出要区分抗争(resistance)与收编(coping),后者很可能只是一种逃避主义(escapism),成为资本主义宰制的共犯。

格吾咸批评文化研究尽管常将“权力”挂在嘴边,但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却往往忽视“权力”的真正源头——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宰制结构。格吾咸认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主要的宰制结构,但文化研究则更强调种族和性别的矛盾。然而,以对大众传媒的分析为例,格吾咸认为在分析肥皂剧时不可能不研究电视这传播机构,而在研究广告和逛街购物(shopping)时,也不可能不去探讨各种生产、零售和市场推广策略。因此,对格吾咸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宰制形式(包括种族和性别的宰制),最终仍是建基于经济的宰制结构之上(Garnham 1995)。格吾咸的结论是,必须要重建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否则文化研究将由于缺乏对社会科学的更广阔的分析,而有所缺失(Garnham 1997)。

同样是任教于 Communication Studies 的美国学者格罗斯堡(Lowrence Grossberg)在 CSMC 同期的回应文章指出,格吾咸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当中资本以一种机械的方式由头到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其实质是拒绝思考社会实践中的矛盾性质。此外,格罗斯堡认为,格吾咸贬抑种族和性别的重要性,乃是一种经济决定论。事实上,文化研究并不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当中的经济不平等现实,但却否认种族和性别矛盾可以直接投射到阶级关系之中。

格罗斯堡进一步指出,格吾咸心目中的文化研究,其实是十分狭隘的。他认为,大部分的文化研究并没有把愉悦等同于抗争,也不会将所有愉悦都当成是好的或政治上进步的;相反,文化研究经常指出愉悦是可以被权力的压抑形式所操弄或至少被扣连进既存的不平等结构之中,因此愉悦也可以是压抑的和反动的。格罗斯堡认为,格吾咸的政治

经济学只是对作为商品或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的“文化”感兴趣,而非认真地对待文化,甚至没有认真对待资本主义。

尽管格罗斯堡承认不少文化研究的著作并没有足够地重视经济的面向,并承认文化研究往往忽视探讨宰制结构自身,而是更多地书写关于宰制结构是如何地存活着的。不过,他认为倘若不讨论后者,便会很容易重新回到有关群众和日常生活的(西方)左派老调中。

归根结底,格罗斯堡认为格吾威的政治经济学实质是拒绝正视扣连(articulation)的问题。然而,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事业,文化研究也不是,因此问题不是要文化研究还是要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探讨两者应有怎样的关系,而是要追求一种非决定论的,以扣连作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探讨经济(或“资本主义”)是如何被扣连于有关文化的政治的分析之中。所以,对格罗斯堡来说,问题不是要求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合,因为两者从未结亲;相反,格罗斯堡要求的,是两者学习如何相处。

然而,另一位 Communication studies 的学者简尔拿(Douglas Keller 1997)介入两格的讨论,指出格吾威挑起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其实意义不大,甚至可以说是一次“非论争”(non-debate),因为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之分只是建基于一种随意的学科分工,而实际上要讨论文化,便一定要探讨当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必须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面向;反过来说,要讨论(政治)经济,也无法不触及符号、呈现、价值等文化面向。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基本上都是超越学科的知识践行,因此两者并不存在对立的关系。

简尔拿以霍尔(Stuart Hall)著名的编码/译码(encoding/decoding)理论模型为例,指出这文化研究的分析范式,基本上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导言(Grundrisse)为原型的,而这种分析方法,可用于说明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和其他传媒文化的生产/再生产和接收(消费)过程。例如要了解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和麦当娜(Madonna)的“成功”,便一定要分析他们的市场策略、广告、公关、形象管理和 MTV 的技

术等环节;同样,在讨论色情媒体的社会影响时,也不能只分析文本的影响和读者的接收,而应该同时分析性工业(sex industry)的生产过程。对简尔拿来说,文化研究包含了政治经济和文本分析,也包括对读者接收过程的研究。与格罗斯堡相似,简尔拿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以一种非决定论的政治经济分析,来丰富文化研究。

霍尔(Hall 1992)则以艾滋病讨论作为例子,从相反的方向道出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紧张而互补的关系。他指出,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往往要面对不能仅从理论去化解的具体问题,例如面对这么多人(特别是贫困的第三世界人民)死于艾滋病,文化研究的分析有什么用?自然,这样的问题也不应导致简单地否定文化研究的结论。事实上,正如霍尔指出,艾滋病的问题也同时是谁被表述/再现(represent)和如何表述/再现的问题;况且,不仅人会死,欲望和喜悦也将可能被扼杀,因此,文化研究不应被取消,而应该学习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如何开展工作(Hall 1992:285)。

格吾咸和格罗斯堡之间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争论,尽管没有立刻产生十分建设性的结论,但也不像简尔拿所指一样,毫无意义。至少,这次的论争冲击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互不交往的学科规训框架,有助于清理由这种狭隘学科分工而导致的“真分割、假汇流”。晚近出现的(政治)经济学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及文化研究对政治经济面向的日益重视,正是进一步将两格论争引向一建设性的方向²。

尝试糅合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y),一方面打破将经济与文化看成为相互独立的实体的框框,另一方面则尝试改变经济是客观硬科学而文化则是主观软性因而是相对次要的学科偏见。文化经济学由 Paul du Gay 和 Stuart Hall 等提出,他们并以日本的 Sony 公司早期生产的 Walkman 为例,探讨一种如何具体地从事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方法(du Gay et al. 1997)。Paul du Gay 等提出了一个文化流程(the circuit of culture)的模型,当中包括五个环节:表